

鄞州文史



第四辑 (2007 年)



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主办

鄞州文史

YIN ZHOU WEN SHI

第四辑 (2007 年)

宁波市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

宁波市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

主 任 唐 军

副 主 任 王飞龙 朱国富

委 员 姜芬琴 朱富国 宁鲁鸣 鲁宝明
邵永国 曹怀玉 戴松岳

《鄞州文史》编委会

主 任 朱国富

副 主 任 姜芬琴 邵永国 戴松岳

委 员 谢富国 施国裕 张善庆 张忠良
徐 敏 许静杰 陈 勇 史晓卿

主 编 戴松岳

副 主 编 史晓卿

主 办 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

编 辑 《鄞州文史》编辑部

地 址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568号

邮 编 315100

电 话 0574—87523806

传 真 0574—87523832

E-mail daisy@nbyz.gov.cn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陈 勇

刊名篆刻 史晓卿

印 刷 宁波精英制版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7年8月

目 录

特别报道

- 鄞州区政协等举行王应麟与《三字经》学术研讨会
..... 史芸飞 卢 豪 (001)
- 王应麟与《三字经》学术研讨会纪要 文史委 (005)
- 宁波市召开《三字经》学术研讨会 潘起造 (009)
- 在王应麟与《三字经》学术研讨会上讲话 唐 军 (012)

专题研究

- “《三字经》作者历史公案”的一种解读 郑传杰 (014)
- 《三字经》究竟是谁写的? ——与李健明先生商榷 郑建军 (035)
- 王应麟的三字句和宁波话中的“三字谣” 桂晓燕 (050)
- 《三字经》作者归属之争及其背后 王重光 (055)

鄞州人物

- 献身核能事业的院士——戴传曾 章国荣 (067)
- 北宋教育家楼郁诞辰千年祭——楼郁诞生千岁纪念 俞信芳 (072)
- 明州状元第一人——姚颖 包芝江 (081)
- 中国禅宗佛教文化艺术使者陈和卿
——兼论陈和卿的故里 邵启龙 (094)
- 孤岛才女苏青 南志刚 (103)

望族研究

- 绵延七百余载的甬上望族——鄞屠氏谱系考述 袁 慧 (130)

浙东学派研究

- 李邕嗣黄宗羲诗论见解异同述
——从杲堂梨洲交往角度看 梁一群 (153)

正本清源

- 白云庄考.....谢国旗 (164)

中外交流

- 白云飞扶桑 佛光照东瀛
——宋元鄞县白云寺无学祖元与日本佛教交流
.....杨古城 曹厚德 (173)

佛教文化

- 千年古刹慧日寺.....谢福明 (180)

文化学术

- 程端礼与《读书分年日程》.....张 伟 (185)
《红楼梦》与宁波有关资料考述季学源 (194)
千古悲歌李慧娘戴松岳 (208)

书画艺术

- 寻找真实的沙耆沙天行 (214)
其人与笔俱风流——寓贤赵种青事迹考钱永兴 (236)
金石学与考古学大家马衡史 波 (247)

民国春秋

- 陈宝麟与鄞县五年事业计划建设.....鲁 刚 (257)

甬上风情

- 宁波的喜庆·婚俗.....周时奋 (268)

尘世旧影

- 王伯桥：“剃头村”的故事巫莲莲 (279)
唸伴.....翁绍初 (286)

鄞山鄞水

- 天童国家森林公园：宁波的绿“宝石”.....俞珠飞 (288)
美丽的家园萧皋硖史芸飞 (294)

山川风物

 庙沟后、横省石牌坊述略.....张德华 (300)

音坛体台

 宁波人与奥运会.....谢振声 (309)

 南宋宁波音乐歌舞活动初探.....张如安 (322)

鄞城往事

 近代慈善医院的创办及其运作

 ——以 20 世纪初宁波一地为例.....孙善根 (336)

 论近代宁波对外贸易对区域社会经济之影响.....沈月红 (348)

四明物华

 远去的风景——宁波人用过的老家计.....冯炜达 (363)

 大嵩石考略.....忻 巨 (377)

掌故轶闻

 沙孟海与杨霁园.....朱道初 (393)

旧文新读

 五柳庄记解读.....余有丁 李燕津 (396)

鄞州区政协等举行 王应麟与《三字经》学术研讨会

史芸飞 卢 豪

“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感召力究竟能持续多久？”这个偶尔会萦绕在心的问题，在5月27日举行的王应麟与《三字经》学术研讨会被人们再次提出来。当天的研讨会少不了因为作者归属问题的一番唇枪舌战，也将更多的目光投向王应麟的精神和《三字经》对后世的影响力上。当王殿卿、梁枢、吴光、包伟民、杨多文、吴铮强、金涛、王重光、戴松岳、郑传杰、郑建军等来自北京、安徽、浙江等地的20余位专家学者阐述多年研究成果时，人们再次领略了这本蒙学读物的感召力。

《三字经》是知名度极高的优秀国民启蒙教育读本，数百年来，一直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具有传授基础知识和传统思想道德的双重功能。《三字经》有着丰富的内容，排列也极有章法。书中文笔自然流畅，朴实无华，深入浅出，情真意切。

《三字经》的作者是谁？尽管从明代开始，这桩学术疑案的争论已持续400多年，不过各个时期的学者多认定《三字经》的作者是鄞州人王应麟。

王应麟(1223—1296)是南宋鄞县人，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先世河南开封，后迁居鄞县。据《鄞县志》等史志记载，王应麟自幼聪明好学，9岁通《六经》，是宋代著名的神童。18岁中进士，调任扬州教授，后又中博学鸿辞科，以博学多才名震朝野，《宋史》称其学问渊博“罕有伦比”。他历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累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宋亡后在宁波月湖边的小巷里闭门隐居，教授儿孙，著书立说。所有著作只写甲子，不书年号，以示不向元朝称臣。

王应麟一生著作宏富，所撰经、史、子、集等著作达685卷。如果说整个宋代，文学天赋最高、成就最大的是苏东坡，那整个宋代读书最精、

学问最博的就是王应麟了。

此次学术研讨会由鄞州区政协和宁波文化研究会、宁波行政学院浙东学术研究所联合举办,旨在进一步挖掘鄞州人文历史,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向宁波人民介绍王应麟这位先贤的成就和思想,向世界展示这位先哲的事迹和风采。

鄞州区政协主席唐军在会上致辞。他说,《三字经》这部以“人之初,性本善”开头的启蒙读物,在明以前人们提及该书时,并未提作者,但从明末清初起,众多的《三字经》版本都注明为王应麟所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相的《三字经训诂》和贺兴思的《三字经注解备要》。由于这两位都是蒙学大家,因此人们大都认同他们的观点,自清代以来至今出版的千百种《三字经》版本中,绝大多数都注明为王应麟所作,或相传为王应麟所作。不过由于最初的《三字经》没署作者之名,因而不同的意见也有存在,主要有宋末区适子所作和明代黎贞所作两种。由于《三字经》为南宋末期作品,因而黎贞所作绝无可能。而认为区适子作的意见,从广东学者黄佐提出后,时有人重提。去年以来,广东的学者以《三字经》作者为区适子的观点发表了论文,并以此进行申遗,从而使这个虽有不同说法,但人们久以公认的《三字经》作者成为学术争论的热点,成为一个新的“公案”,并在浙粤两地以及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宁波的众多学者撰写了许多文章,对广东学者的观点进行批驳,并从各个方面论证了王应麟为《三字经》作者的理由。

唐军表示,一本《三字经》不可能有相隔数千里的两个作者。现在既然《三字经》作者的争论已经展开,那就有必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弄清事实真相,以充分的论据论证《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这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但至少我们的研究将推动《三字经》及蒙学的研究。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海娟,区委常委、副区长胡晓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麻承照,区政协副主席朱国富,区政协秘书长姜芬琴等参加研讨会。

《三字经》究竟是谁写的?研讨会上,专家普遍认为《三字经》的作者为王应麟。

浙江社科院研究员、浙江儒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光指出,考《宋史·王应麟传》所著录的王应麟著作,有《蒙训》70卷、《小学紺珠》10卷、《补注急就篇》6卷、《姓氏急就篇》6卷等。这些著作或者是儿童启蒙读本,或者是普及性知识读本,王应麟所撰《三字经》很可能就在《蒙训》70卷中。将《三字经》与《小学紺珠》、《补注急就篇》、《姓

氏急就篇》作比较研究,发现他们不仅有共同的三言韵文句式,而且在思想上存在着可以互相印证的思想联系,如三才、三光、三易、二帝、三皇、三代、三王、四方、五谷、六畜等说法,这可作为《三字经》初编本的作者是王应麟的文献佐证。

宁波学者郑建军表示,现存最早的版本实物证明《三字经》作者确为王应麟。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明确注明《三字经》作者的版本实物,是清乾隆年间安徽歙西人徐士业根据康熙丙午年山东琅玕人王相的训诂本校刊的《三字经训诂》。所谓“训诂”,就是注解,王相注解的是王应麟的原本。王相在康熙丙午年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言简义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也。”这本《三字经》刻本实物,加上新发现的乾隆四教堂的《三字经》刻本,有力地证明了《三字经》的作者是王应麟,比顺德档案馆展出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版本足足早了100多年。

宁波学者戴松岳从《三字经》流传的现象论证了它必定出现在宁波。其理由有二。其一,从《三字经》流传的途径看,它在国内外同时流传,且国外流传比国内还早。早在《三字经》初成之时的南宋末期,日本已传入《三字经》,明初又有了日语《三字经》,此后又传入俄国、欧洲和美国。国内至明初已传遍全国。河南宁陵人吕坤称当时社学蒙童都以《三字经》为最初读物。而中国古代在宋代和明代时与日本通航的城市只有宁波一个港口,《三字经》在成书的第一时间传到日本。

其二,从《三字经》带有极明显的南方方言痕迹又能无障碍地迅速流传全国来看。只能是具有鲜明地方方言特点又能为北方语言区儿童所接受的南宋官话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从音韵学上看,用现在的普通话读《三字经》有许多不协韵处,而用宁波(鄞县)话来读,则朗朗上口,非常悦耳。这表明该书作者在编写时是以南宋官话来编写的。由于作教材,所以采用了书面语,因此与普通话有相通之处,便于流传全国。押的是当时的官韵,由于鄞县紧靠都城临安,在方言中保留了大量的南宋古韵,因而如今用宁波话读特别押韵。

如果我们今天要普及国学教育,就需要组织力量,尽快编出一部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承上启下的《新三字经》;要深刻研究王应麟与《三字经》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在儿童教育中的历史;建立设立中国童蒙研究教育会,设立“六一”童蒙教育节……一些专家则将目光投向《三字经》的文化意义和思想价值,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殿卿表示,以

《三字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优秀传统蒙书,是当今学校德育的优秀教材,对于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三字经》讲父母、老师、环境、学生,这四个教育因素各自责任及其良性互动,构成了科学、有效的教育过程,揭示了教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三字经》从一到十,数与文相结合,用三才、三光、三纲、四时、五金、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高度概括了儿童所需要的生活伦理与自然常识;《三字经》用历史上发愤勤学的人物故事,勉励儿童日日夜夜,口读心想,发奋向上;《三字经》用历史上男女老少成人成才的榜样,激励幼童立志追求、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全面发展;《三字经》对儿童教育,坚持了正面教育、鼓励为主、榜样故事、语言概括、易诵易记、日常人伦、生活常规、倍感新切、切实可行、很少空泛。这种童蒙教材的特点,至今仍有参照的价值。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三字经》于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启蒙的读物,它更是文化在人生最初的承载,也许我们会在成长中逐步地淡忘它、远离它,可是当年岁渐长,一个安详静默的午后,它又会忽然在记忆深处翻腾而出,那朗朗的读书声,穿越千载时空悠远清朗地继续传唱着,带着文化传代的使命继续远行、远行。



王应麟与《三字经》学术研讨会纪要

鄞州区政协文史委

2007年5月27日，鄞州区政协联合宁波文化研究会、宁波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浙东学术研究所在甬港饭店举行王应麟与《三字经》学术研讨会，以讨论《三字经》的文化价值和作者问题，并以此纪念宁波的文化名人、宋代伟大的儿童教育家王应麟先生。区政协主席唐军、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海娟、区委常委、副区长胡晓明、区人大副主任麻承照、区政协副主席朱国富、区政协秘书长姜芬琴、宁波文化研究会会长金涛、秘书长潘起造等出席了会议。朱国富副主席主持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专家有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东方道德研究所所长王殿卿、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浙江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光、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宋史专家、博导包伟民、安徽教育出版社编审杨多文、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吴铮强。宁波的文史专家方祖猷、乐承耀、虞浩旭、王重光、王介堂、郑传杰、戴骅、张如安、郑建军、俞信芳、杜建海、吴学军、何静、王国安、徐晓虹等参加了研讨会。鄞州区文联主席施孝峰、文化局副局长忻明飞、五乡镇党委副书记卢纳新、宣传委员廖文剑、区文化馆副馆长陈素君等有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唐军主席代表主办单位讲话。他说：王应麟是南宋鄞县人，据《鄞县志》等史志记载，王应麟自幼聪明好学，9岁通《六经》，是宋代著名的神童。以博学多才名震朝野，《宋史》称其学问淹博“罕有伦比”。如果说整个宋代，文学天赋最高、成就最大的是苏东坡，那么整个宋代读书最精、学问最博的人就是王应麟了。他的《三字经》风行中国700多年，1990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三字经》推荐为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之一。可以说，王应麟之于宁波，犹如孔子之于曲阜，王安石之于临川，苏东坡之于眉山，鲁迅之于绍兴……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因此作为宁波的文化

人,我们有责任向宁波人民介绍这位先贤的成就和思想,向世界展示这位先哲的事迹和风采。

唐军主席还说:现在既然《三字经》作者的争论已经展开,那么就有必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弄清事实真相,以充分的论据论证《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这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但至少我们的研究将推动《三字经》及蒙学的研究,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作出贡献。唐军主席希望各位专家在会上各抒高见,明辨是非,以还事实以真相,还学术以真实,还舆论以公正,还作者以公道。

研讨会上,宁波的专家首先发言。王重光、郑建军、郑传杰、戴松岳等人就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论证,方祖猷、乐承耀、杜建海、虞浩旭等就《三字经》的研究及传统文化挖掘发表意见。下午,王殿卿、吴光、包伟民、梁枢、杨多文、吴铮强就《三字经》的作者和文化价值及当代国学研究等问题进行发言。麻承照、卢纳新、忻明飞就王应麟墓地保护和《三字经》申遗等问题发表意见。桂晓燕作了书面发言。市文化研究会会长金涛和区政协副主席朱国富就会议研讨成果作了小结。

宁波学者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从各方面论证了王应麟是《三字经》的作者。其论据和论证方法较原先成果又有了重大进展。郑建军提出广东学者李健明作为区适子是《三字经》作者的主要依据是黄佐所说,而经他考证,黄佐在提出此说时,曾表示此种说法流传于民间,以后持“区适子说”的广东一带学者,都是黄佐说的翻版。郑传杰则提出论据,来说明《三字经》是如何传到区适子手里,又怎么被黄佐编为“区适子为《三字经》作者”的。他认为“区适子说”形成于黄佐编纂《广东人物志》,而黄佐主持编纂《广东人物志》时已是晚年。他有多名弟子担任了分纂。其中就有个区仕衡的九世孙区大任。而区适子是区仕衡的族侄。因此,将《三字经》作者按在了区适子之上。郑传杰还认为当时在临安(杭州)太学读书的区仕衡将《三字经》带到顺德,从而转到区适子手中。戴松岳和王重光就《三字经》的传播途径提出意见,认为就目前得到的研究成果看,《三字经》以宁波为中心向四周传播,最早于南宋末年传到日本,然而先传北方,次及西方,尔后南下,就历史上的著名《三字经》研究学者如吕坤、赵南星等都在北方,尔后的王相、贺兴思、许印芳、徐士业则在南方。戴松岳还就《三字经》的对外传播提出了新的论据。一是目前掌握的最早传到欧洲的《三字经》是明万历十年(1582)罗明坚所译的《三字经》译本,这也是除日本外最早的外文译本。另一个是法国学者老尼克在清道光年间的游历中,对《三字经》的高度评价。这个评价明确提出王应麟

(伯厚)是《三字经》作者。他在清道光年间撰写的《一个番鬼在大清国》的《秀才治学》篇中写道:“家喻户晓的《三字经》尤其以文章的结构闻名,也因此得名。作者是宋代儒家学士伯厚,他将全书分为多列,每列两句,每句三个字……最后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并举例为例。从未有过如此清晰明了的概述,而且诗歌般的韵律让人很容易就牢牢记住这部百科全书似的手册。”这个史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时流传的《三字经》已公认为王应麟所作。二是外国人对这部小小的启蒙读物予以极高的评价(诗歌般的韵律,百科全书似)。这从一个侧面论证了《三字经》的作者和价值。

京、皖、杭的专家发言,开拓了研究的视野,提升了我们对《三字经》研究的认识,提出的一些宝贵意见具有指导意义。

长期致力于东方道德研究的王殿卿认为《三字经》中一直把孟母作为“中华第一位母亲”,从而引起中华母亲节的倡议,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三字经》传递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功能。他还认为以《三字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优秀传统蒙书,是经典,更是当今学校德育教育的优秀教材,传承《三字经》,探究文化经典与当代学校德育之间的关系,对于提高德育的实践性,具有重要意义。吴光研究员提出力图弄清《三字经》的原作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重新认识《三字经》的文化意义,深刻发掘其在当代的思想价值。他认为《三字经》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它是一部历时700多年、经过元、明、清、民国时代众多学者反复斟酌修订、堪称千锤百炼的文化启蒙读本。他还说,作为蒙学教育读本,《三字经》还用了大量篇幅说明勤学、苦读的道理,重视儿童知识结构的全面性。这对当代编纂启蒙教育读本乃至社会教育的通俗读物都有启示价值。宋史专家包伟民认为要确认王应麟为《三字经》作者,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他在韩国的书目中,发现有《三字经》明刻本和清康熙五年的王相《三字经训诂》本,他建议在文献中寻找直接和重要的证据。

专家们还建议在宁波建立童蒙研究基地。王殿卿倡议在宁波建立童蒙教育研究中心,以研究《三字经》为主,同时关注其他的蒙学著作和蒙学教育,他还倡议在“六一节”的同时开展“童蒙教育节”。吴光倡议尽快编订《新三字经》,他说现在虽有多种《新三字经》,但并没有得到公认,要组织力量,尽快编成一部适合新时期的《新三字经》。专家们还建议宁波应组织国际性的《三字经》研讨会,出版一部《三字经》集成。

宁波学者乐承耀、方祖猷、杜建海和鄞州区忻明飞、卢纳新等人也从拓宽研究视野,增强宣传力度,保护王应麟墓地等遗迹和建立王应麟纪念馆等方面提出建议。麻承照提出要把《三字经》研究作为一项事业,创

出品牌。

金涛和朱国富分别作了总结，金涛在总结中认为这次会议集中反映了近半年来宁波学者对《三字经》作者问题的研究成果，从各方面论证了王应麟是《三字经》的作者。京杭专家的意见，开拓了《三字经》研究的范围，开阔了研究的视野，提升了对研究的认识。会上提出了加强研究王应麟与《三字经》，不断深入，扩大影响和加强宣传、传承《三字经》文化，构建蒙学教育活性生存形态的建议。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希望鄞州在《三字经》研究中能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朱国富在总结中说这次会议有四个方面收获。一是对《三字经》作者是王应麟提出众多新的有力的证据。二是论证了《三字经》是蒙学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蒙学之冠”。三是指出了《三字经》在当代中国仍有很高的价值，对当代的儿童教育有着极大的意义。四是要做好做强《三字经》和作者王应麟的研究品牌。他还表示鄞州区政协将在今后更注重王应麟及《三字经》的宣传、研究，以实际行动告慰先贤于九泉之下。

鄞州区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委主任邵永国、副主任戴松岳，主任科员史晓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邱忠武、杨云海，秘书卢豪，行政科长梁德明等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宁波市召开《三字经》学术研讨会

潘起造

由鄞州区政协发起筹办,并联合宁波文化研究会及宁波党校(宁波行政学院)浙东学术研究所主办召开的《王应麟与〈三字经〉学术研讨会》5月27日在甬港饭店举行。北京、杭州和宁波等地的专家学者、以及鄞州区政协主要领导、鄞州区委、区政府的有关领导30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共同就《三字经》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三字经》对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三字经》和儿童启蒙教育的关系、《三字经》在当代的人文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本次研讨会取得的主要研讨成果有:

一、《三字经》和王应麟的关系

前段时期广东顺德和宁波两地学者关于《三字经》作者到底是谁的激烈争辩,促使了国内学界尤其是宁波各界人士对于《三字经》这一珍贵历史文化的高度关注。上月在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示名单上,《三字经》落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顺德文化部门邀请多位广东省文物专家进行研究论证,进一步为区适子著《三字经》说求证,同时计划邀请国内有关专家举行全国性研讨会,以获得学术界的权威认可。由此看来,有关《三字经》作者到底是谁的问题还需要作研讨。宁波学者王重光、戴松岳、郑建军、郑传杰等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在本次研讨会上进一步从《三字经》的三字句式、押的音韵、历史版本、文本流传途径等各个方面,论证了《三字经》的作者应是宁波人王应麟。宋史专家、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教授则认为: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关于《三字经》作者的问题,不管是王应麟还是区适子,到目前为止都没

有直接证据证明,比较妥当的说法就是“最大可能是王应麟”。“但根据历史背景来看,《三字经》的作者首推是王应麟。”因此,包教授建议宁波要继续寻找证据,不仅要从全国图书馆中搜寻,还要从海外尤其是日、韩等国的图书馆中去找。他还提议,作为王应麟故乡的宁波,应当把所有版本的《三字经》汇集起来,出版一部《〈三字经〉集成》。与会专家都认为:宁波应当召开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研讨会,广泛邀请各地学者来共同研究这个问题。

二、《三字经》与儿童启蒙教育的关系

在研讨会上,与会领导和学者都认为,我们现在研讨《三字经》文化,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确定它的作者到底是谁的问题,而是在于通过对《三字经》的研究,要深入思考如何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来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我国青少年德育教育专家王殿卿先生指出:重视蒙学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在儿童蒙昧无知之时,加以启蒙教育,使之努力学习,修养正道,是一种至善至圣的功德。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在2004年的“5·12”讲话中强调:为青少年创造“优良的文化环境”,生产“优质的文化产品”,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是当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当前,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或争夺,主要是在文化领域。外来文化从文字、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性文化、价值中立、心理治疗、生活方式等,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载体,全时空、全方位,无孔不入,潜移默化影响着我国未成年人。所以,对于青少年的德育养成是我国当前一个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他认为:数千年来,一代代中国人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编写了上千种启蒙教育课本,通过私塾和官学等形式教育了一代代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不断推陈出新作出了历史贡献。其中,世传宋代王应麟所作的《三字经》,是古代蒙学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三字经》对儿童教育,坚持了正面教育、鼓励为主、榜样故事、语言概括、易诵易记、日常人伦、生活常规、倍感新切、切实可行、很少空泛,被誉为“千古一奇书”。作为一部童蒙教材,它不仅教育了儿童,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是当今的“德育教材”难以达到的。《三字经》早在19世纪中叶影响就广及海外,现在又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选作《儿童道德丛书》之一。因此,《三字经》不仅是中国儿童教育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在我们宏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时,更应该珍惜它。为此,他提议:作为王应麟故乡

的宁波,“对于《三字经》的态度不能玩玩就算了。”要让更多的宁波孩子诵读《三字经》,知道《三字经》。同时可以结合“六一”节设立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童蒙教育节”。

三、《三字经》的文化意义及其在当代的思想价值

浙江社科院研究员,浙江儒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光先生在会上则这样说:学者们力图弄清《三字经》的原始作者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重新认识《三字经》的文化意义,深刻发掘其在当代的思想价值。他认为:《三字经》是一部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于一书,既富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的儿童启蒙读本。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由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废弃不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大失策。在中国社会进入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并在为构建多元和谐的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今天,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三字经》的文化意义和思想价值。他指出:《三字经》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它是一部历时700多年,经过元、明、清、民国时代众多学者反复斟酌修订、堪称千锤百炼的文化启蒙读本。尽管用现代眼光看来,其中还有些不合时宜的文句,但从整体结构及其基本精神而言,《三字经》无疑是一本优秀的国民启蒙教育读本。其内容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以“仁、义、礼、智、信、中、和”为基本范畴的价值观,以及勤学、力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同时,《三字经》作为“蒙学教育”的知识性读本,很重视儿童知识结构的全面性,既授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又授以当时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这种教育理念及其朗朗上口的韵文式语言结构,对于当代编制启蒙教育课本乃至社会教育的通俗读物都是有启示参考价值的。所以,吴光先生呼吁:要将《三字经》列为中小学素质教育课本,建议我国教育部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组成《三字经》修订编改小组,尽快编出一部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承上启下的《新三字经》。王殿卿教授也如此认为:面对多元文化的冲突与和合,中国文化再次走向世界,国学热不断升温。研究《三字经》的由来、发展及其历史价值,探讨当代儿童的国学启蒙教育,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亦应是当代思想家、教育家的一种历史责任。